价值多元视角下的“马基雅维利问题”

——以赛亚·伯林《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读书报告

**梁焯杰**

夫有惊世之言必有遗俗之累。举凡大思想家建构的理论体系，以常人观之，纸上谈兵者数见不鲜，匪夷所思者亦为寻常。用“语不惊人死不休”来形容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或许更为合适。这也导致了近五百年过去了，对其评价仍纷争不息，至今无法盖棺论定。“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墓志铭都显得多余”。“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似乎是暴君的顾问，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似乎又是一个国家自由的崇高代言人。”莎士比亚称马基雅维利为“凶残的马基雅维利”，殊不知马氏却如同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般，有着多重面孔。“有多少个政治思想派别，就有多少个马基雅维利”。即使是几百年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仍然以胸有成竹的神秘微笑模样透视众生。

马基雅维利的思辨蕴含了对自身政治实践的体悟和对当世政治观察的反思，后世看来更显意味无穷。对于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另辟蹊径，将马基雅维利收入“反潮流的思想家”之列，试图分析马基雅维利众多惊世骇俗之语背后可咨现代社会借鉴的意涵。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最大的价值在于揭示出了道德体系内在的冲突困境，无意间成为了多元主义的理论先驱。

**回溯——马基雅维利的传统解读**

在《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的第一部分，伯林旁征博引，将长期以来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分为三类，其中不乏生僻之见：一种观念认为他是一个“热情的爱国者、民主派和自由的信仰者”，《君主论》意在警告人们抵御暴政。同时也认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和“爱好和平的人文主义者”。另一种观念认为他是一位“冷静的专家，他在伦理和政治上皆无所信持，是个客观的政治分析家和首先中立的科学家”，是“一个对时代形势十分敏感的人”，是“一个拒绝基督教原则，而主张理性、政治统一和集权化原则的人”，因而是一位“卓越的现实主义者，对乌托邦幻想避之唯恐不及”。最后一种观念认为，他是个“魔鬼附体的人，要把好人引向毁灭”，是一个“大颠覆家，恶行的传授者”。

伯林饶有意味地指出，马基雅维利本人的文笔简洁直率而明晰，但却让后世在对他的意图上进行解读时产生严重分歧。这源自马基雅维利对令人吃惊地对自然法、对基督教道德，对传统等的大无畏解构。马基雅维利笔下的自由更加纯粹，马基雅维利眼中的宗教成为了社会粘合工具。伯林借用梅尼克的话说:“马基雅维利的学说，是一柄刺入西方人政治学身体的利剑使它哀号，使它和自己开战。”

**伯林的解读——多元价值与选择**

马基雅维利最让人诟病之处莫过于对基督教道德基础的解构，理解这一点要跳脱出中国式的思维，中国的传统叙事语境中没有长期处于政教纠缠这一部分，因而对宗教无孔不入影响生活和思考的氛围我们也很难感同身受。但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当我们谈论马基雅维利的时候，必然绕不开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观。

伯林自然是不认可对马基雅维利的毁损，但他同时也对克罗齐式的马基雅维利阐释不以为然。克罗齐为代表的一部分思想家高度评价马基雅维利将政治和道德截然分开的壮举。于他们而言，政治经历了马基雅维利之后确认了本身的非道德性质，这让政治解放与独立，政治学开始有了科学的研究态度与方向，使得自身得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伯林认为克罗齐的讲法把马基雅维利更大的价值给忽略了，是买椟还珠式的解读。

伯林首先特意强调，生活在伽利略和培根100多年前的马基雅维利，应用的方法是实验规则、观察、历史认识、抽象反思的混合方法，类似于前科学阶段的实用医学，与同辈的文艺复兴大家达芬奇的研究方法不谋而合。因此，不能牵强附会地说马基雅维利主张科学政治观。

伯林出乎意料地指出，马基雅维利根本不是不讲道德，也不是一个所谓的价值中立者。“马基雅维利的成就不在于把政治学从伦理学中解放出来”，也不在于揭示“道德和政治这两个相互独立的王国之间的冲突”，“他所成就的事情要比这深刻的多——那是对两种不可调和的生活理想的区分，因此也是对两种道德的区分”。马基雅维利强调古典道德的价值虽然“不是基督教的，但它们也是道德价值”。换言之，马基雅维利并非强调政治和道德的对立冲突，而是通过公开了古典共和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冲突，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行为与生活方式、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对立。马基雅维利实际要表达的是两种“宗教”的对立。最终，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对立，即中世纪的、基督教的、传统价值体系和文艺复兴的、“世俗”价值体系的对立。

伯林认为这种道德分立的结果是“个人道德和公共组织”这两个世界及两种“伦理规则”的并存，而人们所做的无非是“在两个互为冲突的价值体系之间极端排斥的两种选择”。马基雅维利选择了后者，同时毫不犹豫地打破了前者，如伯林所言：“想煎蛋卷的人，不打破鸡蛋是不行的。”

具体而言，马基雅维利个人的选择是共和国的荣耀而非自身灵魂的得救。“我爱我的祖国甚于爱我的灵魂”。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高度颂扬了古典共和道德，“除了现世荣耀等身者，例如军队的将帅和共和国的君主，古代的信仰从不美化其他人。我们的信仰推崇的，却是卑恭好思之徒，而不是实干家，它把谦卑矜持、沉思冥想之人视为圣贤，古代信仰则极力推崇威猛的勇气与体魄，以及能够使人强大的一切。”所谓“古老的信仰”，自然是指古罗马的异教，古罗马的宗教催人奋进，塑造好公民；反观基督教，循循善诱人们行善，灌输的却是来世彼岸世界的美好幻想，这对现世城邦的幸福无济于事，而“鄙薄武功”的风气使人懦弱，更不利于强盛祖国。

在伯林看来，马基雅维利没有否认建立了赫赫工业的领袖们有践踏基督教道德的行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佛罗伦萨固然文化璀璨，但这不能掩饰政治上的危机。彼时欧洲大陆诸如法国西班牙等已然成功建立起强大与统一的民族国家，这让经济发展迟缓、政治上封建割据，在应对外敌入侵和处理内部分裂中深陷困局的意大利更显落寞羸弱。马基雅维利从未忘记过自己追求的始终是一个强盛，统一，完整的意大利共和国。他生于斯长于斯，但是如今这个国家却是“比希伯来人受奴役更甚，…比波斯人更受压迫…比雅典人更加流离分散，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并且忍受了种种破坏”。我们可以理解马基雅维利无比渴慕有一个伟大领袖能带领民族摆脱蹂躏，带领意大利走出分崩离析的心情。这些只能靠政治，靠决断，靠强悍的罗马公民道德。

这个选择不是马基雅维利一个人的绸缪，实际上也是意大利人必须面对的选择。马基雅维利指出的是这样一个困境：古罗马人的道德观与基督教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选择了上帝，罗马的异教徒们只能携手下地狱；拥护共和，基督教又哪里能立足于罗马城中。基督教信仰与罗马共和传统只能居其一。实际上，它们本身也都有可取之处，但是在不兼容的前提下，人们需要做的是择其一处之。

马基雅维利之所以鄙夷和拒斥基督教道德，无非是在形式急迫的现实政治背景下，政治家不能仅限于谦卑忍让。马基雅维利认为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不利于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可能最好形式的社会和国家。为了复兴古罗马荣光，他愿意放弃灵魂拯救。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道德本身不是原罪，遵循基督教道德的好人也值得敬佩。马基雅维利的辛辣笔锋针对的是虚伪的政客们，想开疆拓土、扬名立万，就不要再扭捏作态地上演各种基督教包装的政治丑剧，做英雄就要敢于直面下地狱的结果。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尼科洛的微笑：马基雅维利传》开头讲述的“马基雅维利之梦”：马基雅维利在弥留之际，对陪伴在他身边的朋友们说，他在梦里遇到了两伙人，去往天堂的是奉行基督教道德的品德高尚的人；下地狱的是异教徒政治家柏拉图、普鲁塔克、塔西佗们。马基雅维利对朋友们说，自己宁可下地狱与柏拉图们为伍，也不愿意上天堂煎熬。

所以马基雅维利不是简简单单地完全切割开政治与道德，而是在两个道德标准之间做出了困难而坚决的抉择。在这一意义上，伯林一再强调“马基雅维利的价值，不是工具性的，而是道德的和终极性的，他呼吁人们为这些价值做出重大牺牲”。

**多元世界中何以自处——伯林眼中马基雅维利的价值**

多元主义相对应的正是伯林大力批驳的一元主义。在此文和《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的其他篇目中，伯林指出，发源于柏拉图并一直“支配着欧洲人的思想”的一元论，实际上是虚假的，荒谬的，不人道的。人们斥责马基雅维利宣扬“目的证成手段合理”，殊不知这本是一元主义的内在逻辑。一元主义苦苦追寻的是一种能纳入所有问题的完满的解决之道，他们的世界观是宇宙和谐，万法归一，大道永恒。世界犹如“巨大的生命之树”。一元主义者们因而笃信存在着唯一终极真理，重要的是通过理性找寻到终极真理。不管是柏拉图的“形式逻辑阶梯”，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生成逻辑模式”，抑或“斯多噶学派和基督教会及其世俗化后裔的神性的罗格斯”，无一不是遵循这样的逻辑。

马基雅维利是如何成为多元主义先驱的？伯林认为，马基雅维利在面对道德困境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恰恰是他在选择上的果断和毅然决然让读者们感到“剧烈的道德不安”。马基雅维利“在无意之间，几乎是偶然提示出的、令不舒服的真理，即并非所有的终极价值都必然是相互协调的”。这在根本上动摇了一元主义者的理论根基。马基雅维利基于政治现实进行的选择又让人们怀疑，不依赖于一个最高的价值诸如善和理性等，那将如何在价值冲突中确定唯一标准？这是对古希腊先贤和基督教神学家们的思想正统的极大背离。“在马基雅维利之后，怀疑的态度传染了所有的一元论学说”。

因此，伯林认为尽管马基雅维利未曾明确宣布，但已然传递了一种信息，即“存在着多元主义，或必须从中做出自觉选择的价值二元论”，所以即使马基雅维利本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这样的想法后世不得而知，但伯林仍让毅然决然地将这位他视作“多元主义的创始人”。在思想史意义上，伯林认为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是他提示出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他在后来者的道路上竖起了一块永恒的问题之碑”。

理解伯林对一元主义的警惕和批驳不能忽视了反思极权主义的社会大背景，与同时代的诸多思想家如阿伦特等相似，如何避免现实的强制与压迫重现是伯林的核心关切之一。一元论本身对秩序的追求对人们具有强烈的感召力，但这种错误的信念在道德与政治实践中常常会造成巨大的人性灾难。一元主义背后隐含着一个可怕的范式：一旦一元主义者们确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终极真理，接下来的行径就是改造现实，让真理图景实现在尘世。以目标牺牲普通人便有了正当性，将“伟大的生活方式”强加给群体也有了理论凭据。20世纪上半叶极权主义导致的种种恶果为伯林的这一论断提供了证明。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地狱的路,原本都是想去天堂的”。因而伯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应当抗拒形而上学一元论的诱惑。

实际上，多元主义与一元主义相比，立足的不是超越的理念世界，而是日常经验。实际上，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如此，人们并不是只有一个共同目的，生活也不是只有一个价值。世界并不是完全和谐的，大自然也有风雨雷电，自然灾害。生活的常态恰恰是不断地衡量舍弃，甚至是不断直面冲突。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鱼肉和鱼刺相伴而行。

多元主义现实之处就在于不掩饰这种冲突，多元主义尊重的正是人们的个人选择。多元主义者不认为有唯一的终极价值，也不认为各种终极价值之间可以通约，不存在一种普世理性来衡量价值高低。关于人应该怎么生活本来就不应该有定见甚至成见。实际上，各种价值的关系应是韦伯所称的“诸神之争”，决定权交还给每一个个体，而不是全体人民投身于乌托邦的建设。只有认识到了现实本身的多姿多彩，才能以自由宽容的态度维护与包容多元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这暗含的就是自由的意旨。

总而言之，历史语境下的马基雅维利，是为了佛罗伦萨和意大利而写作的伟大爱国者；是以勇敢强盛的异教精神来挑战流行的基督教道德的革命家。以赛亚·伯林则对马基雅维利的教诲赋予了全新的意义。马基雅维利不止能唤起我们的激情，也揭示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困境，在道德多元的矛盾上，我们唯一能凭恃的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是自我对自我的体悟，也是自我的自由。